

论道

为全球数字技术规则重构贡献中国智慧

■ 耿召

伴随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所产生的聊天对话、生物识别、脑机接口等诸多应用正为人类生产生活带来颠覆性变化,其强大的通用性、自主学习能力以及推理能力为既有社会治理体系的变迁产生重要影响。诸多新要素的融入为全球数字治理营造新的态势,带来诸多未知的可能。在传统的网络空间治理体系向数字空间治理转型的过程中,涉及道德伦理、技术标准、议题规则等数字技术治理领域的一系列规范体系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同时,传统网络空间国际规范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譬如西方国家与新兴国家网络治理模式与价值理念之争、已构建规则约束力不足、宏观规则与技术标准制定进程存在“鸿沟”等诸多问题,这些都成为传统网络空间国际规范面临挑战的具体表现。诸多人工智能产品得到广泛应用表明,数字技术的迭代速率与普及度远超以往认知,在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中国如何在制定数字技术国际规范上把握先机,是亟需考虑的一项紧迫任务。

科技伦理治理是数字时代重要命题

前沿科技发展过程中,伦理道德准则指导着如何推进技术创新,如何应用技术、发展技术,这始终是规范的基础领域。在人工智能技术加持下,通过“可视人”“物理人”“生理人”“智能人”等不同发展阶段,各类“数字人”产品的“学习性”“自我监督性”“社会性”等属性凸显,发展下去此类应用会愈发呈现出“人的意识”属性,同时在自主学习其行为与认知方面或会超出既有设定的范围,进入人类无法控制的领域。随着数字技术的智能化发展,各类“类人化设备”(机器人)愈发接近于真人,尤其是未来的“数字人”开始更多呈现出真人所具有的喜怒哀乐的情感,现有道德伦理愈发难以约束这些新变化,人类对其也存在难以控制的可能。未来“人”的定义是否会突破传统伦理道德认知的范畴;如何赋予人工智能“类人化设备”合理的情感认知;如何在人工智能机器人自身感知与自然人情感之间明确一条合理边界;这种“类人化”设备所具备的“意识”与传统知识谱系中的概念存在怎样的差异,这些都推动着传统科技伦理共识的调整。同时,人工智能产生的诸多“数字人”应用,在模仿人的意图、人的情绪、人类价值观念

【核心观点】

◆未来“人”的定义是否会突破传统伦理道德认知的范畴;如何赋予人工智能“类人化设备”合理的情感认知;如何在人工智能机器人自身感知与自然人情感之间明确一条合理边界,这些都推动着传统科技伦理共识的调整。

◆随着中国近年来着力推动包括标准在内的制度型开放,参与国际标准体系的能力与意愿持续上升。中国需要在国家标准制定上进一步细化数据的获取与集成,细化底层标准,并深化官方机构与产业界的联系。

◆中国需要把握机遇,引领国际社会摒弃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差异,理性站在全人类的视角上审视数字技术国际规范体系,推动构建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国际共有规范。

等一系列拟人能力方面会进一步提升,如何围绕这些新变化进行伦理界定,并通过伦理规范提升监管能力,也是不容忽视的议题。近年来,我国日益重视人工智能伦理问题,2022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指出,重点加强生命科学、医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科技伦理立法研究。微软、谷歌等科技巨头也着手开展人工智能伦理研究,欧盟也及时出台一系列人工智能伦理指导文件,更加审慎地监管人工智能发展。因此,未来我国的网络信息治理机构、科研院所的科技伦理专家、哲学与社会学等社科界伦理道德研究领域学者以及相关团体协会需要共同协作,通过学界、产业界共同体建设与国外同行探索构建一套适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智能社会伦理价值体系,这也是丰富与发展数字时代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应有之义。

技术迭代创新倒逼国际标准的修订

对技术发展予以规制是推进技术合理发展所遵循的重要原则,标准则是约束技术发展的关键性专业规范。诸多人工智能新应用的出现进一步印证了技术的迭代创新之快会超出各方预期,基于人工智能与语言处理、智能搜索、机器学习、神经网络等领域的紧密联系,对物联网、车联网、显示技术、区块链、量子技术等各类数字技术标准

建设产生突出影响,对既有国际标准的修订也产生极大的倒逼效应。因而政府、社群、技术人员等各方亟需围绕相关技术标准开展协作交流,及时推出具有一定前瞻性的技术标准体系,这有利于防止技术无序发展所带来的未知风险。一方面,随着中国近年来着力推动包括标准在内的制度型开放,参与国际标准体系的能力与意愿持续上升。实际上,围绕人工智能底层算力算法相关的技术标准,各方一直持续推进建设,这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所发布的相关标准化文件中得到体现。同时,中国在底层技术层面虽不断取得突破,但在开源数据集、数据模拟与仿真等领域尚未达到最高水平。因此,中国需要在国家标准制定上进一步细化数据的获取与集成,细化底层标准,并深化官方机构与产业界的联系。政府层面则需要重点关注数据开源过程中所产生的安全问题,着力推进国家安全、个人隐私保护等不同类型国家安全标准建设,积极对接既有全球高质量标准,在保障安全前提下为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的有效衔接提供制度与政策保障。

另一方面,中国在深层次完善国家标准层面满足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发展的同时,产业界、技术界专业人士也需要及时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国际电信联盟(ITU)、互联网协会(IETF)、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等国际机构深入对接。中国数字企业同样需要加大与人工智能企业的联系,增进信任了解,围绕人工智能的演进模式、学习模式、数据库建设等多个层面构建具

备执行力的标准,共同提升全球数字标准化治理水平。

发挥国际机制差异化效用尤为关键

传统的网络空间国际法治理机构,既涉及联合国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UNGGE)、开放式工作组(OEWG)、网络犯罪政府专家组(UNICG)等一系列治理机构,也包括类似于《塔林手册》的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等西方主导的区域机制。但随着人工智能各类应用的快速普及,全球数字规则建设面临新的挑战。智能革命时代,受制于东西方价值理念与治理模式的差异,数字技术国际规则所面临的既有问题如何在数字技术迭代跃迁过程中得到化解,考验着国际社会的智慧。构建基于发展、安全、责任、利益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中国应在各类国际机制中深化参与,避免既有的数字规则治理体系走向阵营化,坚决反对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创新成为大国博弈乃至对抗的工具。同时,与人工智能技术相关的网络安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犯罪、数字恐怖主义等相关议题类型复杂,涉及利益攸关方多元,各类国际机制发挥差异化效用就显得尤为关键。

第一,联合国作为全球性国际组织,权威度高、覆盖成员广,涉及各类数字技术治理议题,治理机制也相对成熟,理应成为各方构建符合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优势平台。同时联合国也将推动各方开展人工

智能技术良性竞争,维护全球数字空间战略体系稳定,促进各方有效协作,避免大国陷入人工智能“军备竞赛”,中国将会是推进联合国发挥主导性力量的坚定支持者。

第二,欧盟、东盟等区域性国际组织很大程度上承担着区域数字规则建设,范围更为聚焦,更适应区域内成员数字产业发展。中国作为东盟、欧盟等区域组织重要的域外合作伙伴,理应在前沿技术层面加强交流合作,在有效规则下促进人工智能应用产品的推广与技术普及。

第三,各类前沿人工智能产品的经济价值凸显,数字经济比重不断加大,构建数字经济规则体系也离不开世界贸易组织(WTO)、亚太经合组织(APEC)、二十国集团(G20)、七国集团(G7)、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专业性国际组织。中国在参与上述国际组织事务以及与其他专业机构的合作中,需要积极设置数字经济治理议题,及时弥补人工智能技术与金融、医疗、教育等产业深度融合中所产生的规则空白,提出可行方案,推进相关治理机制的成熟。

第四,中国近年来自身也在利用自身优势构建国际平台,提升相关机构在数字规则治理机制中的影响力,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同时,中国也应积极推动其他从事国际安全、国际金融等国际组织治理议题的适度扩散,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其中。例如,面对数字技术所引发的地区安全议题,上海合作组织可在地区网络安全规则制定中发挥更多作用;面对数字经济时代传统金融秩序所面临的诸多不确定性,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也将成为弥补相关规则空白的重要参与者。因此,中国作为新兴数字大国,应更为主动地推动既有网络空间各议题规则突破现有约束,促进其适应数字时代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大规模普及应用所带来的变化,对标数字技术转型,促使国际社会塑造更为完善且与发展现状相适应的数字规则体系。

综上所述,诸多人工智能产品的出现充分表明,人工智能技术的商业化普及之路已全面铺开,各类数字技术形态与传统产业乃至各类治理议题均产生密切联系。新的数字治理形势下,各方迫切需要在技术迭代进程中进一步弥补缺失、伦理、标准、法规、法律等层面的制度性漏洞。中国需要把握机遇,引领国际社会摒弃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差异,理性站在全人类的视角上审视数字技术国际规范体系,推动构建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国际共有规范。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声音

丰富细节体验 打造上海文创亮点

■ 姜泽

上海文创产业已成为全市支柱性产业之一,是推动上海经济增长、增强外部世界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潜能信心的关键方面。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发力,进一步推进上海文创产业创新发展,提升城市文化核心竞争力。

第一,挖掘三大文化历史细节,具象“上海文化”现代体验。在上海长期的发展历程中,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共生共荣,形成和积淀了大量丰富的历史细节和时代印记,这些都是非常优质的叙事资源:可以借鉴《觉醒年代》《永不消逝的电波》,以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左联五烈士等红色人物为主体,讲述他们在上海工作和牺牲的革命事迹;可以叙述圣约翰大学、雷士德工学院,以及其背后的卜舛济、雷士德等知华友华人士,怀念他们为上海的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可以拓展青浦朱家角、松江广富林、嘉定古漪园等文化符号,发掘内在的历史文化资源与自然资源优势,打造独特的游览体验;可以将视角放在普通人上,寻找具有普遍性、能够引发社会共鸣的典型故事,展现他们在上海的生活与奋斗。将宏观的“上海文化”概念具象至活生生的人物与实实在在的生活当中。

第二,激发“民间高手”创造力,深化文化创根与氛围。激发微小企业与普通民众的参与度,把文创产业的根基细化至市井社区当中来。“高手在民间”,传统与现代交融、本土与外来辉映、有序与灵动兼具、文明与活力并蓄,是上海特有的都市魅力,居住在这座城市的民众天然能够与“上海文化”共鸣,是产出创意文化的不竭源泉。可以将社区工作与文创工作结合,向社区居民征集创意,力争突出各社区的文化特色,如武康路、巨鹿路等具有上海标志性的“城厢弄堂”片区可以产出兼具市井烟火气的产品,在国企员工聚居的社区可以考虑产出具有工业风格的产品,可以利用哔哩哔哩、小红书等在沪互联网公司优势,设置如“城市每日创意”等话题,引领分享生活的vlog、图片、文字等潮流,不断催生更丰富多元的自媒体参与热情,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扩散“上海文化”的同心力,不断形成文创产品的追捧热潮;设立开展面向小微企业的文创大赛,并配套相应的落地措施与发展保障,培养文创产业的长尾市场。

第三,创新“出圈出彩”传播方式,拓宽市场认可和影响。创新传播方式,创造有“出圈”效应的文创“核爆点”,不断拓宽文创产业的认可程度与市场宽度。引导文创产业组织自发性、独创性的传播与营销活动:可以在上海地标性景点组织快闪、彩绘、滑板、走秀等潮流活动;可以与米哈游等在沪大型游戏公司的著名IP进行联动,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有效融合;可以借鉴《典籍里的中国》《唐宫夜宴》等视觉作品的表达方式,以及电影《爱情神话》《鸭先知》等电影作品的成功影响,利用《国域》《繁花》《长恨歌》等植根上海的文艺作品,通过文字、声音、影像等方式将“上海文化”转化成民众喜闻乐见的场景、故事、体验项目等文化新形式。用创新的形式和专注的匠心为优秀文化资源赋能,彰显都市软实力中的叙事能力。

第四,对接科技赋能聚力点,开拓文创产业新业态。利用科技赋能新浪潮,开发文创产业的新业态来创造就业岗位。找准当下青年人才的兴趣点与对应专业领域,用年轻态、时代感的演绎和表达方式吸引人才留沪。通过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在文创产业的集成应用和创新,加快推动电竞游戏、直播经济、网络文学、在线旅游、数字文博等数字文化发展。结合当下ChatGPT的热潮,将人工智能与上海文创场景相结合,开发虚拟导游等相关应用;发挥上海新兴制造业方面的优势,借鉴日本万代(BANDAI)对娱乐产品的运营与授权,对上海重点IP进行发掘与经营,如围绕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针对经典角色开展模型生产与商业联动。凝聚各方力量,突破圈层群体,不断释放“上海文化”的活力、魅力。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

锐见

开路先锋如何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路径

■ 潘闻闻

上海在全球城市中的排名上升是在竞争中比拼出来的,不仅是立足自身纵向比较,更是对标全球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的横向比较。上海智慧和上海方案必将生动演绎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路径和规律作出新贡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肩负着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重任。上海坚持将中央精神、时代特征、上海特点和人民需求紧密结合,领风气之先,勇于改革、扩大开放,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新路,主要体现在“五个融合”。

承担国家战略和自身发展的融合

“大国”对“大城”的支撑是上海高质量发展的基座,国家战略的牵引是上海高质量发展的引擎。近年

来,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全力推进,“五个中心”建设实现重大目标,“三大任务、一大平台”全面落实,上海坚持把国家战略先行先试与上海创新发展有机结合,不断探索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上海承担国家战略的重点区域,在全市乃至全国的发展中发挥着增长极作用,以此为基础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推动上海正在实现三个转变:从规模到能级的实质性转变、从国际性到全球化的跨越式转变、从融入参与国际化到主导引领和配置全球资源的根本性转变。在新发展格局中,依托国家“超大”优势塑造城市“超强”优势,使服务和承担国家战略与上海自身发展两者之间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面向全球和运作全球的融合

新发展格局下,我国正在由被动卷入全球产业链转为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竞争优势由低成本要素价格转为大规模市场优势。上海作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以提升要素市场的国际化水平强化全球资源配置功能,依托开放优势、区位优势、平台优势,从集聚要素体量入手吸引全球要素资源,有效促进全球要素的高效集聚、高效流动、高效输出。目前,金融要素市场的交易规模已经居于全球前列。“上海价

格”范围不断扩容,涵盖了股指、外汇、利率、重要大宗商品等,“上海金”“上海油”“上海铜”等价格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口岸贸易总额继续保持全球城市首位。围绕市场定价权、核心控制权、规则制定权的目标,上海持续提升增强各类要素资源的集聚浓度、链接强度、辐射广度和支配力度,在巩固中提升高端资源集聚功能,在开放中强化内外资源链接功能,在发展中放大全球资源辐射功能,在探索中培育要素资源支配功能。

经济硬实力和文 化软实力的融合

城市功能塑造过程中,经济硬实力和文 化软实力内在统一于综合实力,相辅相成,缺一不可。2022年,上海地区生产总值突破4.4万亿元,继续保持全国经济中心城市首位,已超过巴黎、新加坡等国际大都市,进入世界城市六强。作为“文化大码头”的上海,拥有强大的融合包容力、非凡的前瞻创造力和卓越的潮流引领力,将“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植根血脉,将“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深嵌内核,形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国际竞争力、传播力、亲和力。经济硬实力和文 化软实力有机融合,共同推动上海的经济形态从“量的积累”集合成转

化为“质的飞跃”,城市能级提升从“加法效应”集成转化为“乘法效应”,构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都市发展的战略新优势。

网络节点和战略通道的融合

努力当好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是上海立足“大城”,服务“大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使命。重要网络节点体现为在全球投资贸易网络中,占据节点位置,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对高端要素资源的管控作用。战略通道功能体现为资金、人才、技术、数据等要素资源进出中国的首选通道,以及重要资本、战略决策、关键信息的技术知识控制能力。上海在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方面已经形成广泛的国际连接,成为高度发达的全球联通网络节点之一,并且是跨国公司总部和全球人才进入中国的首选通道门户。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网络中“节点”功能的榜单。在最新排名中,上海已经升至全球第五,进入具有较高集聚和辐射节点功能的“第一方阵”。在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ISC-DI)、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全球创新指数(GII)科技集群排名中,上海分别位于全球第三位、第

五位和第六位。上海以塑造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示范窗口、全球投资贸易网络的枢纽节点、各类要素资源进出的门户通道为目标,初步实现了上海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强节点”和“强链接”功能,成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形象代表。

以人民为中心和创造高品质生活的融合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上海全力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持续全力解决民生问题,积极扩大多层次公共服务供给,努力让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围绕人人共建、人人共享、人人共富、人人可得,提供了丰富的数字化、智能化城市治理手段和社会治理模式,创造了丰富的就业机会、创业平台、事业舞台,构建了丰富的公共服务体系和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上海在全球城市中的排名上升是在竞争中比拼出来的,不仅是立足自身纵向比较,更是对标全球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的横向比较。新征程上,继续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上海智慧和上海方案必将生动演绎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路径和规律作出新贡献。

(作者为上海市社联副研究员)